

ZXFK 红色记忆

□ 吴月

狱中的「春节联欢会」

渣滓洞看守所位于重庆沙坪坝区歌乐山麓，原为人工开采的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43年，国民党军统局看中其地形隐蔽，于是霸占来设立看守所。渣滓洞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之一，曾关押过江竹筠、蔡梦慰、胡其芬、杨汉秀等革命烈士。1949年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仅有三天，特务在溃逃前对革命者进行了集体屠杀，死难者多达200余人。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信仰，然而在这座人间魔窟里，却有了一次特殊的“狱中联欢”。

1949年春节，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捷报频传，消息传到渣滓洞监狱，难友们欣喜若狂、激动不已，大家暗中商定要用春节对此事进行庆祝。大年初一这一天，大家通过策反看守员黄茂才，进行了一天的“春节联欢会”。

一大早，不知哪间牢房唱起了国际歌，一间牢房唱响，大家纷纷响应，一时间，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同志们还利用草纸和香烟纸盒制作了一些贺年片，相互赠送，虽然并不精美，但它却传递着难友们之间浓浓的革命情谊。

过春节、贴春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而狱中的同志们也不例外。男牢平七号牢门上就贴着这样一副春联，上联为“两个天窗出气”，下联为“一扇风门伸头”，横批是“乐在其中”。这副春联引起了一个小特务的好奇，他不解地问道：“你们都被关在这儿了，还有什么好乐的？”一位男同志轻蔑地说道：“你觉得乐不适合，我们就改为苦吧，苦在其中，如何？”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特务只好无趣地走开了。这副春联，充分体现了同志们虽在狱中，但仍然以苦为乐的乐观主义精神。

吃完午饭后，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回家过年去了。女牢的杨汉秀、胡其芬便向已策反的看守黄茂才提出，“今天过年，想表演节目”，请他开个方便。黄茂才见上司不在，于是打开所有牢门，让同志们“开门大吹风”。大家纷纷来到放风坝上，在特务机枪的监视之下，载歌载舞，举行了“春节联欢会”。

男同志们先上场，他们的节目是叠罗汉，十几二十个人围成一圈，然后一层一层往上叠，最上方的人手持鲜花，头甚至都高出了监狱的外墙。大家不仅通过这个节目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最顶上的人可以越过高墙，越过电网，伺机观察渣滓洞周围的地势和环境，为有机会越狱做准备。这个特别设计的节目引起了大家的一片欢呼。男同志演完，该轮到女同志表演了，只见一位女同志将红色的被面系在腰间，带领大家扭起了陕北秧歌，将整个联欢会推向了高潮，让整个渣滓洞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里。而带领大家扭秧歌的这位女同志就是杨汉秀，当时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亲侄女，从小不受家庭束缚，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是一次有着伟大意义的“联欢会”，是在集中营里的一次政治大示威，也是关押在渣滓洞的革命者在狱中斗争所取得的一次巨大胜利。

ZXFK 名人轶事

□ 熊少华

郭沫若陪都时期的才情与风骨

1945年初春，卧病重庆嘉陵江北岸的徐悲鸿，突然见到郭沫若大驾光临，得知他从城里过江到碧溪专程探望自己，喜不自胜。二人相谈甚欢，徐夫人廖静文也忙得不可开交，几进几出，就近买了一些酒菜，款待郭先生。郭沫若凝视着徐悲鸿悬于墙头的水墨骏马图，酒过三巡，不禁诗兴大发，即席挥毫作了一首七绝：

豪情不让千钟酒，一骑能冲万仞关。
仿佛有人为击筑，碧溪易水古今寒。

这一首小诗看似即兴随意，却恰恰可以看出陪都时期郭沫若的才情、风骨和血性。

徐悲鸿作为一个颇具家国情怀的艺术家，值此国土沦陷、外辱当前的时刻，用手中的画笔绘就一幅幅奔腾勇健的骏马，感召国人奋起抗争的信心。徐悲鸿的画与时代和国运紧密相连，他笔下的马具有临危不惧、昂首向前、永不低头的品格，是人格化、精神化的产物，更是一个灾难深重民族最为宝贵的素质。郭沫若以悲歌击筑的典故，将碧溪比易水，表明欲以荆柯刺秦，敢做赴国难、义无反顾的斗士的决心。

望着郭沫若那慷慨激昂的诗句和点画飞动的书法，徐悲鸿早已技痒难耐，然而大病初愈，力不从心，唯不停地称赞感慨。

陪都时期的郭沫若，其生命之花的绽放应当是最为光辉灿烂的。在性情上，他敢怒敢言；在学术上，他独立不迁；在创作中，他酣畅淋漓；在社交中，他恩怨分明。

翻开《郭沫若年谱》，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只身从日本回国，大力鼓动抗战。1938年由广州赴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同年10月武汉失守，他经长沙、桂林，年底抵达重庆，开始了长达七年半的陪都生活，然后于1946年5月离开重庆，尔后辗转北上，定居京华。

“年谱”所示，陪都时期的郭沫若不仅事功卓著，而且创作丰硕，可以说是其学术艺术的黄金时间。他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屈原研究》《石鼓文研究》，以及收入《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专辑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之制作时代》《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驳〈说儒〉》《墨子的思想》《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述吴起》《老聃、关尹、环渊》《宋钘尹文遗著考》《〈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秦楚之际的儒者》等大量富于洞见的历史考据文章，作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译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创办群益出版社，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我们知道，陪都时期的郭沫若就有十分明显的亲共倾向，而当时中共虽然提出诸多改变中国的理想，却实属尚无多少胜算的在野党。他居然无视当道，叫板权贵，不能不谓其风骨凛然。

1948年3月，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在南京主持召开院士选举会。经过五轮无记名投票，许多名流大腕在投票中名落孙山，郭沫若则顺利通过，成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ZXFK 巴蜀经纬

□ 杨耀健

川剧兴盛映巴蜀

川剧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地方剧种，不仅为四川民众喜闻乐见，其传播甚至扩展到云南、贵州部分地区。成都和重庆，是川剧的“老窝子”。

扎根成都 影响全川

明末清初，由于移民入川，各地会馆先后建立，致使多种外省声腔剧种相继流播四川。它们在长期的演出磨合中，与四川方言土语、民风民俗、民间音乐、说唱曲艺融合，逐渐形成具有四川特色的声腔艺术，从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剧种——川剧。

1912年，以成都川剧界领袖康芷林为首，由长乐、宴乐、怡乐等十大戏班的部分艺人联合组成的三庆会剧社成立，可谓群英荟萃，名角如云。因为他们有他们长期演出，说来茶园遂成为全川公认的川剧中心。

康芷林是著名川剧文武小生，人称“戏圣”，不仅擅演《情探》《三难新郎》《评雪辨踪》等文生戏，亦擅长《八阵图》《铁龙山》等武生戏以及《杀狗》等生角戏。他创造了踢腿与变脸两个绝招，风靡一时，后继者络绎不绝，在川剧舞台上闪耀着不灭的艺术光芒。1930年，康芷林到重庆演出时不幸病逝，同仁及戏迷纷纷哀悼。有一副追悼他的挽联写道：“功盖三庆会，名成《八阵图》，概括了他对川剧的突出贡献。”

除康芷林外，成都舞台上还拥有薛绍林、周企何、司徒慧敏等老一辈艺术家，以及杨淑英、蓝光临、晓艇、筱酌、阎传凤等中青年名角。

民国时期，除了可园、悦来茶园，成都市内还陆续修建了锦江茶园、大观茶园、群仙茶园等数十家茶园，川剧演出繁荣，正如竹枝词中所描绘的“梨园全部隶茶园，戏目天列市垣”。这些茶园逐渐演变为剧院，不仅使戏班子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也改善了市民观看演出的条件。经常性的演出，促使戏班子不断增加剧目，拓宽戏路，推动川剧不断发展。

“又新”领军 剧目众多

清末民初，各地川剧班子便络绎不绝来商贾发达的重庆谋生。那时没有剧院，剧团先借朝天门朝天观、中华路张爷庙、南纪门罗祖庙、东水门梅阁庙

ZXFK 史海钩沉

□ 林必忠

天花是人类历史上发病率与致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其肆虐范围广、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令人闻之色变、听之胆寒，是全人类挥之不去的魔咒。而清王朝200多年的历史，就是与天花作斗争的历史。天花多次泛滥，为害生灵，清史上多起清宫疑案亦与之有关。

四处避痘，皇帝皇子命丧天花

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在营筑城堡周边设有庙宇，遇到瘟疫，会第一时间把出痘（患天花病的俗称）的人挪到庙宇中单独安置，由专人照看，大多数最终还是死掉了。其他的人就搬离堡子，在外面隔离。当时的京城盛京（今沈阳）郊外有个天宁寺，就曾作为皇太极躲避天花的地方。每当皇太极派兵入关攻打明朝时，都会谨慎地选择已经出过痘的将领率队，并且特别要避开容易暴发天花的时节。

顺治时期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天花肆虐期，清王朝战“痘”进入白热化阶段。顺治皇帝的一生可以说是和天花博弈的一生，天花不但夺去了他众多儿女，也要了他的命。顺治皇帝一生育有八个阿哥六个格格，因为天花，四男五女在八岁前就夭折了。为了躲避天花，顺治皇帝不但废除朝议制度，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不接见来京的外藩首领，后来又规定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许入京觐见。顺治八年，京师天花大暴发，皇帝和太后冒着严寒到遵化狩猎。这大冬天的，动物们或冬眠或藏身洞穴根本不敢露面，冰天雪地兴师动众出门活受罪，真正的原因还是为了躲避天花。

推广“人痘”，天花防疫初见成效

康熙皇帝登基主政后开始主动出击，防治天花工作走向系统化，成为当时的基本国策。北京城内设有“查

演出。后与茶馆挂钩，戏票包含在茶资内。最初演出川剧的茶园有民族路的“群仙”、米亭子的“翠芳”、机房街的“悦合”等，稍后才有“东舞台”、“渝舞台”。重庆有剧场，源自川剧演出。

重庆本地戏班，以“又新”最有名，早期聚集了小生张宏恩、姜尚峰、袁玉莹，旦角阳友鹤、周慕莲、许倩云，花脸唐彬如、吴晓雷、金震雷，须生张德成、邹西池、车佩新，丑角刘成基、周裕祥、李文杰等，编剧赵佰伯、李净白、李心白等。

重庆川剧剧目数以千计，既有历史剧“五袍”、神话剧“四柱”、传统剧“江湖十八本”等大戏，也有《思凡》《跪门吃草》《乔子口》《晏婴说楚》《迎贤店》等折子戏。这些剧目亦庄亦谐，唱词通俗易懂，很受观众欢迎。

风气所及，本埠戏迷扎堆。劳累一天，晚上看场戏，是普通市民最惬意的享受。但凡大户婚丧嫁娶，必有川剧班子助兴。坐在茶馆里，若是没看过几出戏，哼不出几句唱词，说话都不投机。自发组成的“玩友”星罗棋布，得空就聚会打围鼓，俗称“打玩意儿”。

老市民回忆，那时的山城从早到晚锣鼓响。老市民还说，不少做人的道理、初识的文字，就是通过看戏获取的。

截至解放前夕，重庆拥有大小川剧团20余个，演职员逾千人。

川剧院起 盛极一时

解放后，各级领导重视川剧。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演戏庆祝，邓小平要求北方籍干部也要看川剧。他说：“一、一定要去看，而且一定要看完；二、听见帮腔，不要笑；三、看完了要鼓掌。不爱川剧就是不爱四川，不爱四川就是不爱西南，希望大家学着看川戏。”

1952年，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领导关怀下，西南区川剧队献演的《柳荫记》获剧本奖；《秋江》《评雪辨踪》《五台会兄》获演出二等奖，陈书舫、周企何获演员一等奖；吴晓雷、阳友鹤、刘成基、袁玉莹、曾荣华、许倩云获演员二等奖；张德成、周慕莲、贾培之获老艺术家称号。

1953年，贺龙提议在重庆成立西南川剧院，院

长为老革命朱丹南，副院长为老艺术家贾培之、张德成。演员以“又新”剧团为班底，汇集了成渝两地的名家。川剧院还附设了川剧学校，培养人才。在五一一路，新建以演出川剧为主的“重庆剧场”，川剧院有了固定演出、排练场所。各区县也大多建立了专业川剧团，盛极一时。

1959年，成渝两地演员联袂出访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四国，带去大戏《谭记儿》《焚香记》《美奴传》，折子戏《秋江》《拦马》《柜中缘》《水漫金山寺》。剧中的变脸、吐火等绝技，令在场外国观众目瞪口呆、如痴如醉。这段时期，被称之为川剧的“黄金时代”。

推陈出新 百花齐放

为适应时代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成渝两地开始创作现代川戏。如成都的《红杜鹃》《丁佑君》《40年代的成渝铁路》《秀兰的婚事》等，重庆的《保家乡》《鸭绿江畔》《翠家岗上红旗飘》《江姐》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川剧走进新时代。1978年初，邓小平前往四川视察观看了折子戏，传统戏解禁，万众争看。1982年四川省委提出“振兴川剧”，剧目创作出现多元格局，从狭隘说教走向心灵现实，自创多于改编移植。成渝两地剧作家均有新作问世。如成都的《四姑娘》《火红的云霞》《走向光明》《杨汉秀》等，重庆的《百花公主》《古琴案》《青城恨》《金子》等。



川剧绝活——变脸（资料图片）

清王朝与天花的抗争

痘章京”，专门负责八旗防疫事宜；太医院下专门设“痘疹”科，还广泛征集名医。

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对传统隔离“防疫”方法的继承，且在实施中有所创新。最著名的就是避暑山庄的选择和蒙古各部落首领朝班制度的建立。由于天花的流行，清朝早期蒙古各部入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直到康熙初年，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尽管蒙古王公贵族们声称自己已经出痘，对天花有免疫力，但康熙皇帝仍然充满担忧，“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康熙十六年，皇帝下令在热河兴建避暑避痘行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避痘所——承德避暑山庄。康熙皇帝规定，以后蒙、藏、回、维等上层贵族想要觐见皇帝，可于每年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入围场秋狩，同时觐见皇上。

康熙时期“防疫种痘”的推行是从官中开始的。康熙十七年，正值平定三藩之乱的紧要关头，5岁的皇太子胤禛不幸出痘。尽管前线连连告急，爱子心切的康熙皇帝仍日夜陪在胤禛身边，竟连续十二天没有批阅奏折。湖北候选知县傅为格用民间“种痘”之术（此为“人痘”，与后期从境外传入中国的“牛痘”不同）治疗太子有功，被提升为武昌通判，后成为天花防治史上的关键人物。为了庆祝爱子痊愈，康熙帝还特地举行了一系列的庆典活动，祭天颁诏，搞得十分隆重。随着种痘术在宫中的成功，康熙帝开始大规模推行天花预防工作，把它推广实施到八旗百姓，直至漠南、漠北、蒙古大草原等北方边境。

自此，天花在清朝得到有效抑制，满族人四处“避痘”的惶惶日子暂告一段落。虽然后世仍不免有皇帝死于天花之手，但比起早期满清贵族大量因感染天花而死亡则显得微不足道。在消除了天花的干扰后，满族人在关

内彻底站稳了脚跟，这也为康熙皇帝缔造“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由张球编撰、成书于乾隆六年的《种痘新书》是痘疹专著，共十二卷，论述了痘疹的发病规律和诊治方法，并论述种鼻痘之法，使人痘接种法得以继续推广。乾隆时期，清宫医案中留下大量太医院痘医为皇家子女种痘的全过程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种痘技术的复杂性与风险性。乾隆二十八年春，乾隆皇帝的第十五个儿子永瑛（即嘉庆皇帝）种痘，首先钦天监按十五阿哥的八字查种痘吉时，奏请皇帝、皇后、皇太后等；然后在圆明园五福堂设立一个封闭性的临时种痘护理所，除四名御医昼夜值班观察外，还设十几个太监侍候。种上痘的永瑛，被置于密室中，为了避光，四周都用黑、红两色毡子围住；还专门在旁边的房间设堂，供奉药王、药圣、城隍、土地等，以祈求诸神保佑。御医每天3次为永瑛把脉观察，及时将情况记录在案。半个月后，一切症状消失，永瑛终于结束种痘历程，走出了不见日、月、星光的小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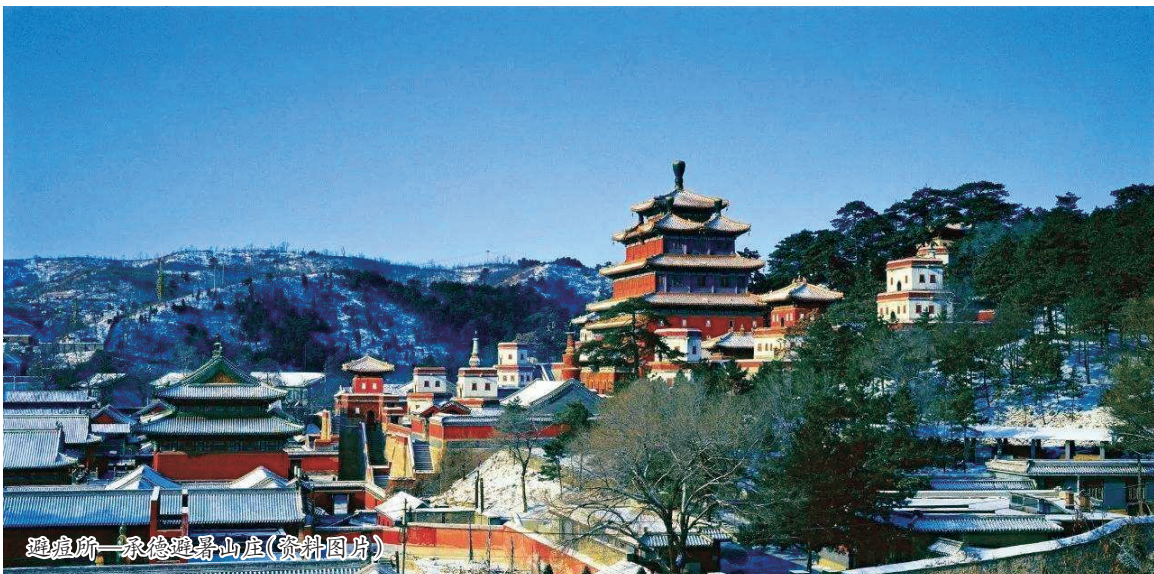
“牛痘”接种，安全经济迅速推广

嘉庆十年，葡萄牙医生哈威特将比人痘更加有效的牛痘疫苗从马尼拉带到了澳门。随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医生皮尔逊又把牛痘疫苗由澳门带到广州。为了在中国推广“牛痘接种”法，皮尔逊还撰写了一本《新订种痘奇法详悉》的小册子；皮尔逊的助手邱煊将十几年间种痘的方法和经验详细记录，写成了《引痘略》一书。邱煊一生接种上百万人，他为两广总督阮元之子进行了成功的接种，使牛痘疫苗获得官方的支持。

从外国传出去的“人痘接种”术，经过改良成为了“牛痘接种”法，在世界转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它的故乡。已有“人痘接种”术经验的中国百姓对更安全经济的“牛痘接种”法表现出空前欢迎的态度，许多地方官员也参与了“牛痘接种”法的推广，他们在许多地方成立了种痘机构，为老百姓免费接种。嘉庆二十年，广州成立种痘处；道光八年，北京设立京都种痘局……“牛痘接种”法迅速在中国大地上推广开来。

然而，或者是大国心态作祟，御医们对来自西方、已在民间流行的“牛痘接种”法充耳不闻，仍旧抱着祖传的“人痘接种”术为皇室贵族种痘。这样一来，清文宗咸丰皇帝奕訢的遭殃也就在所难免了。两岁的奕訢在种痘时差点失败，经御医精心调理总算保住了性命，却也留下一脸麻子，成了继康熙之后的第二位“麻子脸皇帝”。

御医们并没有因为咸丰皇帝种痘的失误而提高警惕。到了同治时期，天花再一次露出狰狞的面目，对爱新觉罗家族痛下杀手，厄运降落在同治皇帝身上。同治十三年10月30日，同治皇帝被确诊感染天花。据《俞同龢日记》记载，同治皇帝得了天花，导致毒热内陷，最终“走马牙疳”而死。清宫中的十六日“脉案”也记录，天花病毒侵入体内五脏六腑，形成多处痘后病毒，并从腰部溃烂，漫流脓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月12日），同治皇帝走完了他年轻的一生，驾崩于斋戒时的寝宫——养心殿东暖阁北面的随安室，时年仅19岁，成为清朝寿命最短的皇帝。



避暑山庄（资料图片）